

谢泳自选集

教育在清华

EDUCATION
IN QINGHUA

教育在清华

作者· 谢 泳

出版 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电话：(022) 27312757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

850 × 1092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9% 字数 180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001—7000

ISBN 7-5306-2756-2/I · 2467 定价：18.50 元

目 录

自 序.....	1
编一本《清华旧事》如何?	1
清华学风.....	3
清华历史系的转型.....	6
清华的校园民主.....	8
维纳访清华	10
老清华的梦想	12
爱自由的北大人	16
北大校长难当	18
北大教授与学生	20
闻一多朱自清颂	22
没有好校长,哪来好大学.....	24
胡适当校长	26
学人论政	28
大学里的自由演讲	30
讲课自由	32

教育在清华

学生与官员	34
反对统一教材	36
教授的新与旧	38
蒋梦麟怎样对待学生	40
想起杨人梗先生	42
《天风阁学词日记》中的陈寅恪	47
钱君匋和万叶书店	53
关于王国维之死的两条史料	56
夏承焘和钱鍾书	59
吴宓的一个见解	63
读常风先生《窥天集》	65
常风评论茅盾	70
如何开启民智	73
韦君宜的新书	76
尊严的丧失	78
劝劝自己的前辈	81
鲁迅研究之谜	83
正视自己的过去	86
建立学术批评的民间立场	92
右派和知青作家群的历史局限	95
林希翎与学生右派	105
罗隆基的一生	115
储安平的一生	178
中国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	245

目 录

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	265
1949 年——1976 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的初步 考察	279

编一本《清华旧事》如何？

陈平原和夏晓虹先生编的《北大旧事》很受读者欢迎，这说明读者是有了解过去的强烈愿望的，这不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猎奇，而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另一种评价。今年又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许多出版社都想借这个纪念日来反思中国现代大学的道路，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老照片》出来以后，有许多仿作，如果仿得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另有新意，又能遵守有关法规，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坏事。现在问题出在许多人不是从《老照片》的成功中总结经验，而是直接从《老照片》中掠夺它已有的经济效益。我见过《老照片》之后的那些《百年老照片》、《老相册》之类的东西，一看就不是正经人干的事，只为了金钱，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也就难免让人反感。

现在《北大旧事》卖得很好，这虽是一本编的书，但确是编得好，编者不但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正在做相关课题的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北大旧事》处处能见出编者的用心，他们想告诉读者什么，想让读者从中读出什么，读者是能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出来的。《北大旧事》的编者是北大人，对老北大

情有独钟，更是感到老北大的精神在日渐淡薄，所以才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更多的人重温旧梦，我想这可能也是这本书为大家喜欢的原因之一吧。由《北大旧事》我想到了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与北大比起来，我更注意清华和当年那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北大是由旧到新，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而清华和那些教会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新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北大和清华在中国现代大学史上各有不同，这不同为后人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资源，胡适就是由清华而北大的，所以胡适在根子上还是清华人，因为他是少年放洋，思想的底子是在清华打下的。北大重要时期的两位校长蒋梦麟和胡适都是清华人，做过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虽是北大出身，但自从遇见胡适以后，思想就变化了，他后来走的路也是胡适那一条。罗家伦也是北大出身，后来做了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1928年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他是由北大而清华的，和傅斯年一样，他最后的路也跟胡适走了。中国最早的共产党人多数是从北大出来的，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等等。北大以思想自由著称，那时的异端多出在北大。清华虽然激进的革命家较少，但中国多数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来自于清华，这是偶然的巧合吗？近年很多人提清华学派，他们多数着眼于学术风格，如果真有这个学派的话，我以为真正清华学派的特征也许更体现在她的思想资源上。我们现在已有了陈平原、夏晓虹先生编的《北大旧事》，有志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社，不妨也来借一点三联书店的光，请清华的学者来编一本《清华旧事》，我想那一定也很好看。

清 华 学 风

国内学术界近年很注意对清华学派的研究，清华徐葆耕先生还出版了专著。王瑶先生生前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清华有无学派，这个学派是怎样产生的，它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学派是仅指人文学科还是包括自然科学，是和清华发生过关系的学者都属这个学派，还是有相对固定的区别标准等等，总之这是一个三言两语说不明白的问题。我以为说学派难，而说学风易。那么清华的学风是什么呢？从制度层面说，一是教授治校，二是学术自由，这两条是一个大学学风能否具有现代色彩的基本前提，老清华是做到了这一条的。老北大也做到了这一条。那么清华和北大怎么区别呢？这是一个问题。从大学自身的发展看，北大是由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而清华是由留美预备学校转变过来的，也就是说，清华是直接与现代大学接轨的，而北大则是由传统学堂过渡到现代大学的。简单说，北大是由旧到新，而清华本来就是新的，这是一个特点。清华在建立大学之前，先建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是1925年的事，1928年清华才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吴宓和李济，从教育背景上说，是完整的中西两面，全部出过国门，对中西学术都有深刻的了解。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这个中西两面的传统对后来清华学风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姜亮夫先生回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活，就特别强调这里的西方文化特点，他说：“从赵元任先生那里，我也得益非浅。他讲声韵学，讲法和我在成都高师听的课完全是两回事。成都高师的先生讲的是声韵考古学，而赵先生讲的是描写语言学（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的声韵学中来）。不过我还是认真听，并把描写语言学和声韵考古学对照得到很大启发，这方面得赵先生之力，是我一生学问基础的关键。（《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集林》卷一第239页）姜亮夫先生对赵元任先生的这个评价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和西方学术结合的开始，清华的学风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姜亮夫先生说，清华研究院的教和学，确实在德、智、体三方面兼顾，尤其那时的学风特别好。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同上第243页）姜亮夫先生晚年的回忆也许有些情感色彩，但不管怎么说，清华当年的学风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没有好的学风，也就没有现代的学术，有了清华的学风才能出现清

华学派。清华大学由于在起步阶段恰好是由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代学者开创局面,所以清华的学术传统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

清华历史系的转型

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并不长,但她的转型却完成得较好。中国的许多事情,其实也并不像有人想的那么难,只要制度好,有些事办起来是可以成功的,至少中国的大学教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述及他当年在清华历史系的经历,就很给人启发。蒋廷黻初到清华时,清华历史系基本上还是传统教法。蒋廷黻是学过现代历史研究方法的学者,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就想用这种现代的方法来改变清华旧的历史教学方法,很快他就成功了。他回忆说:“渐渐的,我认为我应该放弃这批旧学者。我要把他们当做我个人的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在我身边,以便请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在教书时,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我不声不响地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一点麻烦都没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时间。我说:‘现在努力吧,准备开一门课,那么,就是清史吧,你有兴趣吗?你知道清代的大问题吗?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同时为了生活,你必须教一点其它课程。

你愿意教什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点也没有引起麻烦和反对。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对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仁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的作法。因此,拟定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 1929 年与 1937 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蒋廷黻回忆录》第 124、125 页,台湾传记文学版)从蒋廷黻的回忆中我们能够感到在老清华,也不是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他们也在努力使好东西能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传统和现代其实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特别是对像教育这样的问题,没有必要夸大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很强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的特点首先是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一个相遇即融合的过程,好坏一望而知,好东西在哪里都好,教育是这样,其它又何尝不如此呢?

清华的校园民主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风格不同，但这两所大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是清华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可以说为我们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提供了一个例证。清华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她建立和成长本身就是古老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做是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老清华不能说没有毛病，但大体上没有致命的弱点，清华的成功说明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是有创造力的，中国现代教育转型比之于现代政治的转型完成得好，可惜曾经建立起来的现代教育制度后来中断了。但她也提醒我们，教育可以完成，政治也不是没有可能。清华的校园民主对我们就很有启发作用。冯友兰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写过许多这方面的事情。他说清华原来的校风，很重视民权初步，无论教授和学生，凡是开大一点的会，都要照议事规则进行。“我记得在一次教授会议中，有一位教授站起来对某一事作了滔滔不绝的长篇发言，发言以后，主持会场的人问：‘你这是个提案吗？’那位发言的教授，因为初到清华，还不熟悉会议规则，就谦虚地说，

‘这不能算什么提案，我不过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主持会场的人说：‘既然不是提案，现在会场上没有提案，散会。’原来照议事规则，会场上必须有个提案，然后对这个提案进行表决。凡是参加会议的人，任何人都能提提案。他的提案，可以是他自己的意见，也可以是他集中别人的意见。在会议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言，任何人都可以集中别人的意见，但是任何人的集中，都必须作为提案向会议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表决，经过多数赞成以后，才能作为会议的议决案。这样的议决案才算是代表多数的意见，少数人自然就无计可施的了。”（《三松堂自序》第342页）这种校园民主的形成以清华为典型，在其它旧大学里也大致成为一种风气。清华学生会在请罗家伦辞职的时候，第一次会议就没有通过，这在当时是很不平常的事情。那时学校中遇到这样的事，学生往往总是一边倒，在群情激动之下，一哄就把议案通过了。可是当时清华学生还是遵循议事规则进行的，赞成议案的或反对议案的都是有秩序地依次发言，冯友兰对此评价说：“这就是知道怎样行使民主、懂得了民权初步的意义。”（同上，第343页）在老清华，由于有了学生会、教授会、评议会这样一些民主色彩很浓的机构，她的校园民主也是得到了真正实现的，西方的民主思想在中国旧大学里是扎了一些根基的，这个好传统我们不能忘记。

维纳访清华

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著名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在三十年代(1935~1936年)应邀来清华大学访问讲学,这是当年清华的一件盛事。以维纳当时在世界科学界的地位,他能接受清华的邀请,而且在清华呆了两年多时间,这是中国大学的骄傲。维纳来清华,看似一件小事,但细想起来,这件小事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年清华大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我是从文献中了解过去大学的情况的,从纯粹的文献出发,可能有一定的局限,因为文献本身并不是绝对可信的,但我们今天了解过去的大学,除了文献之外,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第一手材料。尽管文献有局限性,但我们从中还是能体会一点当年大学的实情。维纳来清华的直接联系人是当时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李郁荣。三十年代初,李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时候,与维纳建立了友谊,是他诚恳地邀请维纳来清华访问的。从清华对维纳的邀请,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是当时清华教授的世界眼光,二是清华当时的学术环境,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在当年的清华,这两点都是具备了。国立清华大学是在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

的基础上建立的,时在1928年,到维纳来清华时的1935年,还不到十年,从此点可以看出清华当年的发展。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当年清华能有那么好的开端,而且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这与清华从一开始就以西方现代大学为模式是分不开的。由清华的成功,我们可以说,如果起点好,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也许会少走不少弯路。维纳能来清华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清华在1928年改建为国立大学后,实力迅速增长,三十年代初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之一。”(李旭辉《三十年代N·维纳访问清华大学函电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1期第44页)李郁荣先生在给维纳的一封信中说:“清华以工学院拥有的设备和装置而自豪。数学系的图书馆与MIT的一样完善。任博士(指任之恭,他是哈佛和MIT的毕业生,引者注)认为物理系的图书馆要比哈佛大学的更加完善一些。我相信,您会发现这些图书馆为研究工作准备了充分的资料。”(同上,第43页)任之恭对清华的评价,如果不是看到李郁荣教授1934年12月4日给维纳的信,我们很难相信这个说法,但这却是当年清华的实况。也许正是由于清华良好的学术环境,维纳回国后,又鼓动著名数学家、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终身教授冯·诺伊曼来清华访问。诺伊曼夫妇对此很感兴趣。维纳还正式向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李郁荣和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做了推荐。可惜两个月后抗战爆发,这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五十年以后再看维纳来清华这件事,我们只能发出“遥想清华当年”的感慨了。

老清华的梦想

前两年我读过一本汤佩松先生的回忆录《为接朝霞顾夕阳》，这是一个生理学科学家的回忆录。汤佩松先生是一个老清华，他是1917年进入清华的，那时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汤先生一生差不多都在清华，抗战期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他当年在昆明郊区的“大普集”领导的清华生理研究室，被人称为是中国的“皇家学会”。抗战胜利后，汤先生回到清华，那时他的理想就是在清华大学尽快建立一个农学院，为此他将当时中国农业和生物学方面的第一流人才都集中在了清华，他说：“我在1946年底到1947年秋，在离清华‘校本部’不远、美丽而壮观的颐和园对面的升平署，建立了下面这个生气勃勃、年富力强的基本核心队伍。”（清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一辑第28页）汤先生当时的目标是在清华办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农业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场所，类似汤先生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后来在四十年代的Princeto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一样。在汤先生的设想中至少清华农学院应当办成中国农学界的PUMC（当